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一一）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七八期 ——  
（二〇〇七年六月五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706b）

---

【史海钩沉】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陈奎德
【研究述评】文革研究之一瞥：历史、现状和方法	徐友渔
【不堪回首】砸大昭寺——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革命行动”	唯 色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史海钩沉】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 陈奎德 •

本文所探讨的文革中萌芽的自由主义，与人们常说的文革中出现的异端思想，二者的概念应当有所厘清和区隔。文革中的异端思想，宋永毅与孙大进已有专书研究，同时也有其他研究者的一些文章对此作了论列，这里不再赘述。

笔者想强调指出，当年在中国大陆，即使是异端思想，绝大多数也属于一般政治光谱的左半部分，即，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它们多数应被归类于左翼思想的范畴。这一点应当不难理解，思想的出现有其精神土壤，它与其时代的精神氛围相关，具体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它与当年官方马列毛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有关，也与那个时代全球性的社会主义思潮泛滥有关。有鉴于此，中国的思想者很难从非左翼的思想库中攫取思想养料。在这方面，当时中国人赖以思索的精神资源是极为单一和贫乏的。

有鉴于此，应客观看到，即使是当年中国的那些勇敢的异端思想，如湖南的“省无联”思潮（代表作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武汉“北、决、扬”、北农大附中伊林·涤西的思想、五一六思潮、清华四一四、北京中学的四三派人物，大学中的“极左派”，上海反对张春桥和周恩来的红革会和支联站，山东鲁大主义兵派中的“十月革命小组”等等，基本上都没有逸出左

翼思想的范畴，大多不属于自由主义的范畴。

即，在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固然是异端，但多数异端却并非自由主义。

#### ◇ 自由萌动

本文要强调的是，即便在上述极为艰难贫困的精神环境中，自由主义的幼苗仍然在文革中的大陆萌动了。这是一桩精神的奇迹，也是自由主义赋有超绝顽强生命力的见证。

文革中自由主义萌动这一精神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连接毛氏中国与后毛时代之间的鸿沟的精神枢纽。它是催化中国近二十多年来的变迁以及即将降临的更大变迁的精神动力。它是跨越1976年四五事件到1989年六四事件到九十年代自由派新左派之争直到21世纪中国转型的隐形桥梁。它是中国纳入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轨道。

探索中国文革期间萌芽状态的自由主义，受限于两个基本困难，一是此类思想深埋于地下，未曾公开化，原始资料严重匮乏；二是在当时的资讯以及精神条件下，浮出水面的此类思想往往隐藏在官方话语之中，殊难剥离、梳理与整合，大多是只鳞片爪，漫无系统。但是，即便如此，有心人倘若仔细抽丝剥茧，寻绎踪迹，仍然可以看到一条时隐时现的自由思想潜行的脉络。

文革里萌芽的自由主义，渊源于自由主义与基本人性的契合，渊源于对中国当年物质与精神恶劣状况的反应，渊源于外部思想的闪电击中精神荒原产生的激荡。具体而言，是由于两大基本因素的刺激，一是自发的因素，二是来自历史的精神传承和域外零星思想的传入激发。

自发的因素，植根于对苦难现状的怀疑和否定，植根于在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下的个人利益的直觉，植根于在普遍恐惧下的换位思考，导出妥协的需求和权利的觉醒。简言之，源于人性本能的反弹。

历史的精神传承和域外零星思想的传入，则因为以外来思想资源对照现实，引发了深度的心智共鸣，扩展为广泛的理性思考，从而得出了自由主义或近似自由主义的思想成果。

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全面讨论文革中自由主义萌动的全貌，只拟从如下几个关键性的脉络和人物切入，描绘并阐述其概貌。

- 1) 对等级制和血统论的反弹：人的尊严与众生平等——“个人”的发现——人道主义、人性论的破土而出——人权理念——遇罗克《出身论》〔1〕的核心。
- 2) 对失败的公有经济的反弹：触目惊心的懒人社会和赤贫状况——从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2〕——顾准的思考——杨小凯等（关于产权）的思考。
- 3) 对秩序失范、对国家恐怖主义的反弹：从革命民主主义到法治主义——法治观念的萌动——李一哲大字报〔3〕。
- 4) 对政治迫害泛化的反弹：人人自危——囚徒困境——权利法案（含产权问题）——宪政思想——普遍宽容——从杨曦光到杨小凯的心路历程〔4〕。

#### 一、《出身论》：文革中国的人权论

众所周知的遇罗克《出身论》，虽然使用了一些当时流行的语言，但他与当时那些洋洋大观的“理论体系”都不相同，它们之间在根本上毫无关系，他的思考带有根本的性质，即：人道的性质，人权的性质，平等的性质，自由的性质。他思考的出发点与当时时髦的思想根本上不

在一条轨迹上。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拨开其文章表面的文辞，拨开他自称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出身论》就是当年中国的人权论，就是赤色烈焰遍地炙烤的中国大地底下喷薄而出的清凉自然的自由主义言说。因此，虽然缺乏严谨的自由主义的学术语言包装，但遇罗克，在思想上是当之无愧的应归属于1957年以及1949年之前的中国自由主义脉络之中，他是他们的毫不逊色的精神传人。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流行的两幅对联，被称为“血统论”。

在中国大陆，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三十年间，共产党实行着一种堂而皇之公然宣告的等级贱民制度——成分论：国家政权以阶级出身对国民进行等级式划类。“出身”，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人们心上，阴霾、流血永无止期。中国人，无论长幼，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而那些先天的“贱民”，从识字开始，就对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有一种天生的抗拒与恐惧。在一生中，他们遭遇了无数障碍：参军、招工、“提干”、求偶、进大学……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在众人面前，他们总是保守沉默，不愿谈说自己的亲人，甚至回避自己。渗透一切的国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强力灌输下的日常生活，学校、单位，街坊……点点滴滴，早已教会了他们认明自己的身份：即，异类，卑贱者，准专政对象的下等身份。等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就又多出了一个称谓：“狗崽子”。他们的一生无所期待：没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没有爱与被爱的权利，没有写作发表的权利，没有发展自己兴趣和施展自己才能的权利，……只有绝望，只有看不到头的黑暗的隧道，漫长无尽。正义、平等、自由、良知、爱情，事业，幸福，对他们而言，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一划分及其造成的社会氛围，从50年代至60年代逐步强化，至文化大革命初期达到顶点。从半遮半掩的档案内部划类，走向赤裸裸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麻五类”等公开的侮辱性分类。这种出身歧视导致的最极端后果，则是发生在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的对黑五类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杀，甚至吃人。

在这种恐怖和高压的氛围下，遇克的长篇文章《出身论》破门而出，笔锋犀利，逻辑谨严，情感充沛，严正抗议并激烈批判出身歧视，激起了广泛的反响。激发出了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贱民”们的权利意识。

遇罗克在《出身论》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是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虽然在其文章中，他所使用的术语还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和马克思主义痕迹，但其文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确，是呼唤平等与尊严，是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笼罩一切的极权国家，统治者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的。阶级路线、阶级斗争是他们窃取政权的理论基地，也是他们在统治权术上“一抓就灵”的通灵宝玉，万万动摇不得的。由于这个根本原因，“血统论”虽然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但那只是层权力搏斗中的权宜之计。有鉴于此，人们注意到，到后来，“血统论”的始作俑者，一律无事，全部豁免。但《出身论》的遭遇就完全不同了，文章很快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大毒草”，而作者遇罗克也终于因此而以身殉道。

在对待《出身论》的根本立场上，当时中共内部激烈权斗的两派——文革派与反文革派——实际上并无二致。

遇罗克最主要的思想贡献，就是在铁桶一般的封闭中国大陆内部，开启了当年的异端思想——人权意识，这是自由主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大批的黑五类及其子女，仅仅因为出身而死于无妄之灾时，当遇罗克自己也饮弹死去时，《出身论》的出现和传播，在中国历史上践踏人权最黑暗的年代，竖立起了中国人权意识的里程碑。

## 二、顾准：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观念之兴

经济学家和思想史学者顾准的思想贡献，首先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神圣不可侵犯的条笼罩一切的时代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实施市场经济，今天看来，也许是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在四十年前的毛泽东中国，在毁弃私有制的信条笼罩一切的氛围下，却是石破天惊之言。此外，他也是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市场经济必须要有上层建筑法律体系相配套的人。他在研究葡萄牙、西班牙现代化起步早于英美，却被英美远远抛后的历史教训时，已经内含现在人们常论及的“要好市场经济，不要坏市场经济”这一重要主张。换言之，对顾准而言，首先是一个市场经济有与无的问题，其次还有一个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的问题。他的思想之触角，不仅涉及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私有产权的问题，同时也模糊的意识到了英美的普通法体系与欧洲大陆法律体系、拉丁语系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的不同作用。

作为思想者，在文革的艰困条件下，顾准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过自己独立思考而获致的见解。这些见地，在今天也许并不那么惊世骇俗，也许其中还有其不确切不规范之处，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封闭的中国，可谓石破天惊，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诸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希腊罗马那样，发展出来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史官文化”？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取得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赢得真正的进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长期困扰中国知识份子的问题。顾准抓住了它们，陷入长期的孤独的思考，并对它们一一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顾准暗夜中的独立探索，其思想特质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以致不能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所理解。他是一位孤寂的先行者。然而，不容否认，他的思路，却为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开掘了思想的先河。

## 三、李一哲大字报：法治主义的滥觞

“李一哲大字”是文革中第一农业篇对民主与法制的探讨，在实质上，它主要涉及了自由主义关于法治的一些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成果，是在批判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后获得的。

李一哲大字报是批极左的，虽然其术语还带有中共话语系统的特点，但其核心，是从西方民主法治观念出发的。李一哲大字报是文革后期对纷纷乱世、对运动无休无止、对人人自危的社会状况的厌倦情绪的反映，在当时颇得人心，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它为结束文革作了思想准备，也开启了随后的“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的先声。

七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关键的转折时期。经历了六十年代后期的政治社会动乱和经济萧条，特别是一九七一年震惊全国的林彪事件，许多当初文革的热情参与者对现行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和独立的民主思潮实在是自那一时期产生。七九到八一年的民主墙运动不过是七十年代的运动从地下走向公开的结果。

下层人民政治反抗与上层领导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是个非常微妙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个中妙处，存乎一心，局外人极难体会。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共产党高层有意于改革或比较温和的一派经常将下层人民的不满情绪作为自己的政治筹码，而下层运动的活跃分子在经历过文革之后总能通过某种方式与上层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同时也不断地利用上层之间的矛盾来争取更多的活动空间。“李一哲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王希哲描述了当时主政广东的赵紫阳如何采取了迂回的方式，以开展大规模批判李一哲的方式，使大字报广为流传，使作者们获得意料之外的影响力。直至今日，这种上下层间的微妙关系，仍然在中国的民主运动的策略及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大规模的政治迫害的愤怒以及对当时社会分配不公平的不满，成为了七十年代民主和抗议的基础。这也是将“李一哲集团”结合在一起的因素。在七九年获得平反之后，随着共产党上层路线的变化、改革的开展，“李一哲集团”便也出现了无法挽回的分裂，大字报的三位作者也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

然而，李一哲大字报所激起的思想波澜，它对中国法治主义崛起的贡献，将长久留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成为该世纪中国人的精神遗产之一。

#### 四、从杨曦光到杨小凯：自革命民主主义到自由主义

1968年，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横空出世，风行全国，震动京华。不胫而走的异类文章，使他遭受了十年的牢狱之灾。《中国向何处去》带有南斯拉夫理论家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阶级》的思想烙印，也混杂有马克思早期思想以及马关于巴黎公社的原则等因素。是文革中革命民主主义的代表作。

但是，随着他对文革反思的深入以及其他思想资源的影响，随着杨曦光更名为杨小凯后，他后来写道：“我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选举官员、取消常备军、取消高薪等等。而实现这种民主的手段却是激进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国的新特权阶级，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然而他经过长期苦思力索，成年后，他已认识到“革命民主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东西”了。他的思想基地已然转换到自由主义了。如果粗略地说，当年他关注的价值核心是社会平等和大众民主的话，那么，后来他的价值重心则变成个人自由，变成权力平衡了，换言之，如何实现宪政成为他政治思考的中心。这一转折与他对西方政治史、中国历史以及对文革的长期思考有关，同时，也与他与经济学的研究有关。

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他认为文革把“人民”的土匪本性一面暴露无疑，因此中国社会才在文革后期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反革命情绪”。

文革中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各种派别“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的崛起和衰落，恐怖气氛蔓延全国，人人不能自保，任何人都无法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最后就连写进党章宪法的毛的接班人天天被祝祷“身体永远健康”的林彪也死于非命。这使绝大多数人醒悟到：反对对他施加政治迫害，同时也是对自己人身安全的保障。于是，对制度性的人身权利保障成为健在的强有力的社会心理。这二者，只有宪政制度，只有法治，才可能办到。在这方面，杨小凯领悟很早，他是倡导中国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他赞扬英国的光荣革命，强调权力分立与制衡，提出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修改宪法，实现政教分离；他十分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指出后发国家不应该只学先发国家的技术，也应该学习制度。杨小凯提倡宪政的两大理由是，第一，为了经济改革，为了好的资本主义、避免坏的资本主义。

第二是，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之上的，唯有实行宪政才能结束政治迫害。

杨小凯在以后谈到政治秩序的重要性时，已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口吻了：“从中国孔子的学说说到当代政治学都指出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比生产力发展的确更重要。英国的发达是因为自光荣革命建立代议制、两党制，内阁制后三百多年没有政治动乱，美国的发达也是因为她有民主制度保证其二百年长治久安。中国不要有二百年不断政治动荡而中断，不要任何政治家去强调经济为中心，经济一定会世界第一的。但政治不动荡非有结社自由，政党自由，自由选举这一套民主制度不可。从这里而言，唯生产力论是极端错误的。而建立一个公正和禁止任何政治迫害的法治和民主的社会才是长治久安和经济发达的根本大计。”

他后来指出：“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革命是一种政治学中所说的革命，它的特点是，原有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原有的政府和共产党瘫痪，社会处于半无政府状态。政治是在军队，各派政治派别之间玩出来。由于共产党的政治控制已处于半瘫痪状态（除了军队以外），自由结社自然会发展出自由的意识形态。

这就是一九六八年初一种被称为“新思潮”的非官方意识形态发展的背景。这种新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北京中学的四三派人物，大学中的“极左派”，上海反对张春桥和周恩来的红革会和支联站的人物，武汉三钢派中的北斗星学社，山东鲁大主义兵派中的“十月革命小组”，湖南省无联等等。这些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虽还没完全摆脱中共意识形态垄断权的阴影，但他们宣称中国的政体不民主，形成了特权阶层。山东十月革命小组一位人物指出“炮打司令部”应该形成一种制度，群众组织应该容许反对司令部，不论其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这种新思潮的发展说明，只要结社自由成了事实，思想和言论自由就不可扼止。如果不是中共一九六八年用残酷的暴力把造反派镇压下去，自由的思想就会从自由的结社发展出来。我认为结社和政党自由比言论自由重要得多。一旦结社自由，就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有了一个独立于共产党而共产党又吃不下的政治组织，共产党的专制政治就不可能存在了。”

## 五、突破时空的精神交流

1966年以前，中共当局出版了大约1,041本专供高干阅读的图书。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分为两类：一类是灰皮书，大都属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范畴，主要是西方作者或苏联东欧各国的“修正主义者”所写；另一类是黄皮书，主要是文学读物。由于这两类书有特定的封面颜色，因此人们简单地称之为“灰皮书”和“黄皮书”。

在“文革”的动乱岁月里，大量这样的图书散落到普通人手里，它们很快就在学生中间成了“抢手货”，这些书籍给地下读书运动的兴旺增添了素材。

下面列出的书是一份十分独特的书目，不仅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未必知道其中的书名，当时西方国家的知识份子也未必全都读过，但“文革”时期中国地下读书运动的活跃成员们却十分熟悉它们。

“灰皮书”中有10到20本在地下读书活动中特别受欢迎。其中包括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特加·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与未来》，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分析》，弗里德利希·A·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亚当·沙夫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拉扎尔·皮斯特腊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等。“黄皮书”中最流行的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1891—1917年回忆录》和《解冻》，亚

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让·保罗·萨特的《厌恶及其他》，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萨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书目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书的大多数作者，如托洛茨基、吉拉斯、赫鲁晓夫、爱伦坡、西蒙诺夫、萨特和索尔仁尼琴，实际上都是曾被共产主义运动称为“革命的叛徒”或“修正主义者”的人。他们曾经是激进的革命派，觉醒之后又开始反对革命。这种转变，在二十世纪思想史上，是一桩相当普遍的现象。

作为自由主义的精神源头，上述精神养料中，以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影响最深，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传布最广。它们促成了中国当年的少数先知先觉者对共产极权制度的深度批判以及对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认同。

笔者作为一个中国人，记得自己在中国大陆看到《通向奴役的道路》的中文版时是1969年，其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走向“复辟”的阶段。当时的一批“内部发行”的所谓“灰皮书”、“白皮书”和“黄皮书”在极小的圈子内流传，当然要靠极高的直觉极大的精力极广的联系网路才能搜寻到此类书籍。一获此书，笔者竟然废寝忘食，反复研读，浮想联翩；对照当时中国之社会状况，惊叹作者预见力之惊人；同时在猜测中国共产党高层何人有此眼力和胆魄，竟然敢于在六十年代批准（在内部）出版此书？

这些书籍的传布，像野火蔓延，影响了整整一代敏感、痛苦、寻找出路的年轻人。这些影响对于激发或强化中国这一两代人的自由主义萌芽，有着不容低估的催化作用。这些人在1977年之后恢复高考制度后，相当一部分进入大学深造。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变迁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思想、学术和社会政商界的中坚力量，成为中国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主要推动力。

因此，在文革“瓦釜雷鸣”的时代，自由主义的声音，虽然若隐若现，纤细微弱，不成交响篇章，不为时流看重，然而，从后来的演变看，说它是历史的先声，是未来中国的精神种子，是绝不夸张的。

注释：

- 1、遇罗克：《出身论》，载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
- 2、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亦凡书库，1992年出版
- 3、“李一哲大字报”：指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广州街头出现的署名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李一哲是三位作者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的合名
- 4、杨小凯：《中国宪政的发展》，是杨小凯1999年11月18日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中国宪政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参考文献：

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  
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美国，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出版，1997年  
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

□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

## 【研究述评】

### 文革研究之一瞥：历史、现状和方法

• 徐友渔 •

#### 一、西方学术界研究概况

最早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研究的是西方学术界，并且在30年左右包揽了几乎全部研究成果，以至于长期流传着一个说法：“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国外；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是在西方。”

像英文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亚洲概览》(Asian Survey)、《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等学术刊物从1966年夏、秋季就开始发表对于文革的研究论文，它们长期、系统地追踪文革重大事件，分析和评论文革的目的、意义，对中国未来和世界的影响，等等。

《共产主义问题》从1966年9、10月号起刊登专题讨论会“毛主义是什么”的研究成果，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施拉姆(Stuart R. Schram)的论文是“毛及其学说”，另一位专家柯亨(Arthur A. Cohen)的论文是“毛及其政治学”。该刊接着开展总题目为“新革命”的系列讨论，主要论文有格尔曼(Harry Gelman)的“毛和不停息的清洗”，陈(Theodore His-en Chen)的“痛苦中的民族”，特里尔(Ross Terrill)的“围困心理”，迈克尔(Franz Michael)的“权力之争”，等等。

美国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反应也很快，它的社会科学部的人员和顾问在1966年夏末开始系统研究文革，1971年出版由罗宾逊(Thomas W. Robinson)主编的《中国的文革》一书是其第一项研究成果。此书由5篇长篇论文组成，第一篇多里尔(W. F. Dorill)谈文革是权力之争、政策和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物，第二篇哈定(H. Harding)谈毛泽东的政策和组织理论，第三篇罗宾逊谈周恩来，第四篇戈托夫(M. Gurtov)谈中国的外交，最后一篇是巴姆(R. Baum)谈中国农村。

以《刘少奇和中国的文革》一书而著名的迪特默(Lowell Dittmer)把西方研究文革划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关注的问题不同，材料来源不同，但都形成了研究浪潮，并取得丰硕成果。第一阶段是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材料来源主要是红卫兵的大字报和各种小报，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导致文革各种事件的权力斗争，这时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在高层政治精英中的清洗以及升迁；第二阶段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时注意力转向红卫兵的派性斗争，社会矛盾与冲突，一些研究者从逃到香港的文革积极参与者那里获得不少第一手资料；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研究者有可能得到新的资料，对文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1)

研究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始终是中心议题，答案基本上可以分为3种。一种认为是出于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和继续革命的决心。有人相信“防修反修”的说法，认为因为修正主义的根子在人们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目的是造就一代新人。富勒尔(Victor C. Funnell)认为文革产生的原因是毛泽东极为敌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的社会分化，毛担心如果听任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差别越来越大，最后党就会和群众失去联系。(2)



有人则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分析文革的起因。勒斯(Simon Leys)在其著作《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中认为：“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称，毫无革命可言，除了当初计谋上的藉口，毫无文化可言，这是高层一小撮人之间在虚构的群众运动的烟幕之后进行的权力斗争。毛大权旁落，正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他发动了文革。(3)

格尔曼说，毛泽东发现党内从上到下都对他不忠实，因此决定清洗。他还要通过运动来制造一种严峻气氛，使党内决不存在反对派，大家都对他顶礼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后，党也要可靠地实施他的革命蓝图。(4)

较多的人持第三种解释，认为意识形态、政策分歧与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文革》一书的作者认为，文革中发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当国家面临紧迫问题时，领导人之间对于采取什么政策肯定有分歧，而分歧往往发展为尖锐而不可调和，因为这常常和个人尊严与权力密切相关。如果领导人意志坚强、固执己见，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么上层领导就会分裂。(5) 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的观点也属于这一类，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详尽分析了自1956年之后，特别是大跃进失败之后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分歧，说明这种分歧不可避免要导致权力斗争。

有一批对文革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反对把文革看成只是上层的权力斗争或路线斗争，他们认为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划分和对立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们用利益冲突而不是思想认识的不同来解释不同的人参加不同的群众组织。他们的理论叫做“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李鸿永(Hong Yung Lee)、陈佩华(Anita Chan)、安德佳(Jonathan Unger)、骆思典(Stanley Rosen)和白霖(Lynn White)等人都有这样的主张。

李鸿永指出，在文革“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某些社会集团发现他们的利益要求激烈地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另一些人则力图维持现状，在群众和精英层中都发生了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分化。基本区别是对运动对象看法不同，一派攻击“走资派”，另一派攻击知识份子和“牛鬼蛇神”。家庭出身问题成为突出的矛盾，保守派根据家庭出身划分阶级阵线，支持“自来红”观点，激进派根据是否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划分阵营，反对血统论。保守派由出身好的人组成，激进派中出身不好的人很多。(6)

陈佩华、安德佳和骆思典在合写的论文“学生和阶级之战：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中提出，学生的冲突起源于以下原因：一、在60年代中期，大部分城市学生向上的前途不广阔；二、由于入学标准的变化(从重视成绩到重视家庭出身)，学生为升大学展开了剧烈的竞争；三、许多学生的竞争手段是入团；四、政治上的竞争孕育了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矛盾。在文革中，阶级背景的对立转化成红卫兵的派性。(7)

文革的影响和后果是西方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早在1969年，张旭成(Parris H. Chang)就看出，文革对中共的统治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文革中的清洗并未按照党章国法规定的程式进行，也没有明确的标准来判断干部是好的还是“三反分子”，无数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他们其实是无辜的，张指出：文革中对党的高级领导人漫无边际的指控损害了党的形象，这看来是无法修复的。号召造反和夺权的效果是，不仅年轻人，而且大多数人蔑视权威，包括新建立的革委会，甚至中央领导的权威。(8)

泰韦斯(Friderick C. Teiwes)在研究中共领袖合法性问题的专著中认为，文革产生了信任危机，对毛泽东的权威是个重大打击。文革造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不满，其中包括受到虐待的知识份子，在农村过着贫苦生活的知识青年，以及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党政官员。人与

人之间无休止的斗争使人反感，林彪事件使人破除了政治迷信。种种怀疑和不满终于引发了天安门的抗议事件，这是对毛的权威的直接打击。（9）

许多研究者敏锐地看到，文革不仅以武斗伤害了千百万人的皮肉，而且因欺骗和谎言伤害了人们的心灵，尤其是对于年轻人。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其著作《毛和毛之后的中国》的第20章“文革的社会后果”中说，千百万人在文革中因为斗争会、派性武斗、镇压而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留下了严重创伤。孩子们因为父母的问题受拖累，父母遭到子女的批判揭发，数百万人被非法监禁，数百万人在穷乡僻壤虚度光阴。他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前程被毁掉了。青年学生的理想被粉碎，因为文革的崇高目标和残酷的现实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他们从理想的一代变成迷惘的一代。（10）辛格（Martin Singer）以极为惋惜的口吻说：对于多数中国学生而言，文革使他们不可补救地失去了政治上的纯真。这种纯真——以及相伴的乐观和献身精神——对于奋力拼搏以告别过去，并在现代各国确立自己地位的国家而言，是宝贵的资源。这种纯真只会失去一次。在一个老革命家为从不可避免的历史风暴中保留自己遗产的很不成功的斗争中，这种纯真失落了，这是文革的真正悲剧。（11）

也有人看到了文革在大破坏的同时产生的正面影响。白鲁恂（Lucian W. Pye）认为，文革使中共领导打开了眼界，看到了失败的现实，不但看清了文革的弊害，也看到了文革前的弊病。文革还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优越感，能更好地理解 and 利用外国的好东西。没有文革，他们就不会和苏联模式或任何已知模式决裂。（12）

## 二、中国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早在1967年和1968年，许冠三、丁望等就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研究和评论文革的文章，许冠三的文章总题目是“有关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几点解释”，从几个方面论述，分3期连载。（1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批先驱者、思想者，他们之中很多是文革运动的参与者和很有经历的活动者，在70年代就开始了对文革的思考和研究，并以文字系统地、明确地表述、传播自己的思想，不时还有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首先要提到的是刘国凯的《文化革命简析》，它的初稿完成于1971年底，1980年12月载于作者自己主办的广州油印“民刊”《人民之声》的特刊上，这部长达10多万字的论著于1986年由陈佩华翻译为出英文，（14）在美国出版。另外还有王希哲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这是他回应晋君题为“谈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信件的产物，在其中提出了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毛泽东决不是官僚制度的敌人，提出了文革的副产品之一是“思考的一代”在中国崛起，等等。（15）

在80年代中后期相对宽松的气氛中，大部头的文革著作也问世了，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在压制和阻挠中艰难出版，接着，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在1988年发表。当然，官方也批准出版了很少的按照党的决议精神写出的书，比如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席宣与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

1996年是文革发动30周年的纪念日，中国人研究文革的强劲势头在这一年展现了出来。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为此推出4期文革专集（后由刘青峰编辑出版论文集《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16）在日本由中国学人主办的《中国研究》推出“‘文革’三十周年专号”，以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为主编的，在香港出版的《中国研究》把秋季号完全做

成研究文革的专号，香港的《亚洲周刊》5月26日那一期做了题为“文革三十年反思前瞻”的专题，《明报月刊》在10月号上登载王若水的重要论文“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这年5月，“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美国哈佛大学举行“文革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由于有关当局的禁阻，受到邀请的大陆学者未能赴会，会后编辑出版题为《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的“‘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17〕

在中国大陆，也有各种学术活动。几个学术单位召开关于文革的研讨会，199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中央党校召开“‘文化大革命’简史》座谈会”，当代中国研究所于11月5日举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文革研讨会，从多个方面讨论文革，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于11月30日召开题为“1966—1976：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几家杂志做了关于文革的专题，《青年报刊世界》从1995年第4期起每期都有文革专题，直到1996年5月被强令停止，《焦点》杂志7月号有“蓦然回首看文革”的专题，著名的《东方》杂志在5月号上精心准备了一个专题：“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追思”，在发行前被强令撤销。附带说一下，以上3家杂志后来都遭到了停刊的命运。

在于光远的建议和推动下，北京图书馆在这年4月完成“关于北京图书馆对有关‘文化大革命’资料收藏情况的‘查报’”，根据这“报告”北图（现称“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资料共计2611种，66797期。需要顺便说明的是，连负责主持这项工作的学者，以及统计资料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机会接触材料，他们的工作只能靠查阅目录卡片进行。

在“化大”命研究中，香港中文大学发挥了重要基地的作用，而一批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然后在美国大学工作的学者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在自己的专案“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专刊”之下，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多部研究文革的专著（比如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1999年）和唐少杰的《一叶知秋》（2005年））和论文集，他们主编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从2006年2月号起连续5期推出“文革四十周年”的专题。该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与宋永毅等旅美学者合作，于2002年出版发行（中文大学出版社）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该资料库提供了3000多万字的关于文革的第一手材料。这个资料库在2006年进行了升级，增加了1000多份新的文献，成为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大型的网络数据库。

宋永毅等人工作是一种奠基性工作，为同行和后人研究文革提供了必要的方便条件，为中国的文革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早在1998年，宋就和孙大进合作，出版了《文化大革命文献目录，1966—1976》（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76），〔18〕他和周原等海外学者一起收集出版的《新编红卫兵资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一共3辑，共达112卷，包括了2,700种小报；〔19〕他和郭建、周原合作编写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词典》（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已经在2006年出版。〔20〕宋永毅还和孙大进合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他还主编了《文革大屠杀》。〔21〕另一位在美国任教的学者王友琴对文革的研究工作也引人注目，她上世纪80年代起独自一人进行采访，收集第一手资料，记录文革中受难者的个案情况。她办了一个网站，名为“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很多读者通过访问这个网站而了解文革的真相，关心文革这段历史。2004年她把自己的成果汇编出版，书名为《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22〕

据我有限的了解，今年在海外已经出版的关于文革的书还有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23〕西藏作家唯色的两本书《杀劫》与《西藏记忆：二十三位耆老口述西藏文革》，〔24〕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两本书，使世人得以对西藏的文革有所认识，而弥足珍贵的是，《杀

劫》是一本带说明的照片集。另外，今年出版的还有周伦佐的《文革造反派真相》，〔25〕以及刘国凯的“人民文革丛书”4卷。〔26〕

由于宋永毅、王友琴等学者的长期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在几年前就发表评论说，大致从21世纪开始，“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的局面结束了，中国人在文革研究方面开始占居主流和主导地位。我为这种新局面的到来深感欣慰，但与此同时，我又知道，“文革学的研究已经回到中国”这个论断具有阿Q意味，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些学者已经是美国公民，不得不承认，正是能够享受思想、言论、出版、交流自由的条件，才使他们的研究能够进行，研究成果能够发表。

2006年是文革发动40年，结束30年的纪念周年，若干研讨会在困难的条件下举行。3月22日，在北京举行了一个纪念文革的小型座谈会，主持人为郑仲兵先生。郑仲兵先生和他的伙伴编辑了一份非正式出版的小报《往事》，主要刊登有关文革的回忆性材料，这些资料对于今后研究文革是很要的。紧接着，在3月24—26日举行了“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山西等地的学者，以及正在北京从事访问研究的来自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来自瑞典的文革史专家。5月12—14日在美国纽约举行了“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虽然应邀参加会议的多名大陆学者被禁止赴会，但仍有几位学者与会，并且宣读了未能出席会议者的论文。5月17—19日，渤海大学召开了“文化大革命史料收集与整理”学术研讨会。

除了文革的专门研究者，对于研究文革有心和作出贡献的还大有人在，比如，湖南一位休干应山红主编和自费印刷了一本《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又如上海学者王军胜自行刊印近百万字的3卷本《文革沉思录》，这些书籍都分送到了文革研究者的手中。

### 三、关于“两个文革”说的有关观点

“两个文革”说是文革研究中争论最集中、最激烈的问题。

据我的了解，最早正式提出“两个文革”这个概念的是王希哲，他在发表于1981年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他说，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伴随着毛泽东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人民对他的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和抵抗的进一步加强。经过了1966年至1971年感性认识的积累，经过了1971年至1975年比较理性认识的积累，终于在1976年4月3日爆发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27〕

“两个文革”说脱胎于前面提到的“社会冲突论”，杨小凯（又名杨曦光）、郑义、刘国凯、王绍光等人也支持“社会冲突论”。

杨曦光是这么说的：文革史的研究者一般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的理论框架有3种，一是“权力斗争说”，用中央上层政治人物争夺权力的斗争为主线分析文革，一种是中共官方“路线斗争说”，以中共最高层的“两条路线”或“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来解释文革，文革时毛派的官方采用此说，文革后邓派的官方也采用此说，只不过正确与错误调换了位置。再一种就是“社会冲突说”。最后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不仅是上层的权力之争，而且是中国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文革中卷入斗争的红卫兵及各种群众并不是中共领导人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有独立意识，利用文革的机会追求自身利益；文革中造反派的利益表现在反对官僚特权阶层，保守派维护现存体制，即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双方的社会冲突构成文革的主要内容。〔28〕

陈佩华断定说：“1966年至1969年文革是反官僚运动。”〔29〕她还说：“文革刚开始时，造反派被从压迫中解放自己的号召所发动。如果说他们在头一年被中央文革小组操纵，那么他们马上发展成为有自己政治计画的独立力量。”〔30〕杨小凯也一直把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称为“准政党”，说它们是毛玩“自由结社牌”的产物。杨小凯断言：“文革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不满的人”，“1966年8月至1968年中，有两年时间，毛泽东下令停止军队外的共产党组织活动，允许市民在政府注册自组政治组织。他利用市民对共产党体制的不满，利用刘少奇、邓小平对市民进行政治迫害激起的民愤发动了造反运动。这是一场真正的造反，共产党官僚十七年来干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当时的中国有真正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市民运动。这场运动的实质是极右的。”〔31〕王绍光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证明群众组织自主性的论据，他说：“在某个意义上，我们大概可以说，不是毛泽东掌握着文革的进程，正是难以控制的文化大革命推着毛泽东团团转。”他的论据是，毛原先预定文革只搞3个月，结果搞了10年还未达到他的目的，这说明“不是他所发动的运动受制于他，而是他受制于他所发动的运动。他本人成了文革最大的牺牲品。”〔32〕

文革到底是上层斗争还是社会冲突呢？为了概括这两个方面，有人从“两个文革”这一概念中寻找解答。比如，李鸿永反对把文革仅仅看成上层权力争夺，认为文革既包括上层分化，也包括群众的分歧，还包括上下层之间的复杂关系。〔33〕杨小凯也是借助于这个概念：“在上层，这是一场以1959年后政策分歧为背景的权力斗争，而在下层，这是现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组成的保守派与现体制的造反派的冲突。”〔34〕郑义说，他在80年代末发表在《作家》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两个文革”的分析，1989年在《历史的一部分》，1991年在《红色纪念碑》中作了进一步阐述。〔35〕

徐友渔在《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对陈佩华、杨小凯的论断表示不赞成：“应该承认，说文革中造反派的行为动机中包含了反官僚的因素，这是正确的，但这种行为的效果却有两个相反的方面：它在冲击大大小小官僚的同时加强和巩固了头号官僚的地位。套用一句俗话说，造反派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比古代造反者不如的是，现代造反派不仅极易被招安，他们本身就是‘无限忠于’的御林军，他们的造反不但是皇上恩准的，而且干脆就是皇上挑动起来的！”他还说：“应该承认，造反派中除了许多人是受毛的号召造反之外，确有很多人怀有不满情绪，但准确地说，他们是对当时现实中的种种现象不满，而不是对共产党不满。”〔36〕

在1996年纪念文革发动30年的时候，对于“两个文革”说的讨论和争论就十分热烈，在今年，同样的争论更是激烈。刘国凯在《北京之春》2006年1月号上发表“论人民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其中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省市高层中的异己势力。故此，毛的官方文革亦可称之为文革清洗。此外，由于文革中发生了民众反抗运动，毛及地方官僚和军方都各自或联手进行过镇压，故官方文革还有一个内容——文革镇压。文革清洗加上文革镇压就是官方文革的全部内容……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人民文革是毛要搞党内高层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价”、“人民文革由毛泽东的官方文革导出。换言之，没有官方文革就没有人民文革。”刘国凯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当今中国需要再来一次经过升华的人民文革”。

刘国凯的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北京学者刘自立在网络杂志《民主中国》上发表“‘人民文革’说驳难”，认为“只有一个文革，就是类似纳粹杀戮和中世纪不宽容迫害的毛式文革。所有对于文革的背叛和反思，不应该包括在‘文革本身’中”。卫子游在《北京之春》2006年3月号上发表“评刘国凯的‘论人民文革’”，刘国凯发表了回应文章“请以郑重的态度对待历史研究”，对刘自立的“‘人民文革’说驳难”再加以驳难。

关于“两个文革”的争论涉及到对文革中造反派的认识与评价，何蜀在“论造反派”一文中的观点不同于“社会冲突论”：“假如没有这两次大规模平反运动，广大民众不可能敢于起来造反，各地中共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也不可能允许民众起来造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造反派的形成，除去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之外，毛泽东的‘运动群众’，是一个重要原因和前提条件。”何蜀给“造反派”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造反派，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时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核心允许下，以反现代文明的、非宪政民主的、从以往政治运动中学来的方式（如大字报、大批判、揪斗、监督劳动、肉体折磨等），对本部门、本地区以至更上级的官员（特别是执政党官员）进行攻击，直至将其打倒、夺权（真正的打倒与夺权均须得到更上级甚至中共领导核心的批准），在这一过程中，以‘革命群众’或‘革命群众组织’名义结合而成的政治派别或这一派别中的人物。”（37）

周伦佐在出版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中强烈主张重新认识和评价造反派，把泼在造反派身上的污水清洗乾淨。他在论文“‘文革’中造反与保守的主要界线”中说：“虽然按官方的说法‘文革’的时间是十年，但属于群众运动形态的时间不足三年。就全国范围而言，这是以‘路线斗争’取代‘阶级斗争’的三年，这是运动的重点以整党内‘走资派’取代整党外‘阶级敌人’的三年，这也是‘文革’中唯一引人瞩目的三年。群众组织划分为造反派与保守派实际只存在于这段时间。民众之所以大分化、大对峙，只是因为这时在对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各级当权派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划分正是围绕这个轴心展开。离开当时两派群众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分歧来谈论造反或者保守，难免会失去实际的背景。”他还说：“落实到具体的事发起因、行为动机、攻击对象、追求目标，双方的分别就更明显：保守红卫兵的作为，无不是为了纯化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强化极权主义的统治权威，从而维护极权体制的现实统治秩序；造反红卫兵的作为，却客观上淡化了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削弱了极权主义的统治权威，进而冲击了极权体制的现实统治秩序。尽管后者所体现的还不是自觉的民主要求和民主行为，但至少是一种潜在的民主冲动——距离民主主题并不遥远。”

周伦佐在“‘三年文革’说不能成立”中从文革是3年还是10年的角度间接支持“人民文革”观点，背景是这样的：关于文革的时间，有“3年文革说”和“10年文革说”的对立，而“3年文革说”与“两个文革说”、“人民文革说”是一致的。这个说法起源于陈佩华1990年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上的一篇文章“消除对于红卫兵运动的错误观念：重新考察文革派性和分期的必要性”，认为真正的文革只有3年，即群众政治对立，人民起来造反的3年，“10年文革说”是官方，邓小平等老干部的文革观点的表现。

我认为，在1996年和2006年关于文革的两个纪念日产生的最热烈争论都围绕“两个文革”的观点，决不是偶然的，值得文革研究者注意。特别是，今年的观点中，出现了重新评价、正面评价文革中造反派作用的呼声，对于正确地、深入地认识文革，是有意义的。文革确实需要一个“再发现”、再评价的过程。

总的来说，我本人倾向于“一个文革”观点。我的理由是，如果说有另一个文革，那么也只能说是利用第一个文革造成的“无产阶级专政”暂时松弛和“天下大乱”的形势而产生的一些现象、活动，是第一个文革的副产品和派生物，而且规模、范围、支配力与主流文革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当然，事情也不能只从数量上看，第二个文革和第一个相比虽然微不足道，甚至大多数人对它没有感觉，但从历史的发展看，其“意义”则是巨大、深远的。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打倒政敌，大多数人盲目、狂热地卷入这个主流运动之外，毕竟有少数人、少数组织清醒或比较清醒地利用形势，追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目标，他们的动机从一开始，而且自始至终都不是响应毛的号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动摇、改变现行的制度。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记录的趁乱造反的“右派份子”，1966年底在北京和一些地方闹得轰轰烈烈的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就属于这一类。

只有承认和研究这些情况，才能对文革中、文革前中国社会矛盾、民众的生活状况、心理有全面的认识。

#### 四、关于研究方法的几点意见

结合自己研究文革的心得体会，我觉得中国人研究文革要想取得应有的成果，应重视方法问题，特别是以下问题。

首先要明确，研究文革固然是在履行我们应负的历史责任，但一旦具体进行研究，我们就应该把它当成学问来做，不必也不能在文本中让责任感、道义感、历史感彰显无遗而让学术规范和学术风范缺位。事实上，在研究中我们经常看到立场先行，立场、感情压倒理智分析和理性论证的情况。

做学问就要讲究思想和知识的积累和传承，但中国人研究文革往往是白手起家、从头做起，忽视阅读以往文献，尤其不重视、不善于利用西方学者在相关问题上已经取得的成果。西方学者在研究文革时表现出来的最大优点之一是在方法上很有讲究，背景知识相当厚重——特别是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方面具有坚实的、恰当的理论框架，而中国学者常常流于直观的描述和常识判断，夸大自己的直接经验的重要性，有时显得理论视野狭窄。

当然，经验和背景知识之间的关 S 如何，孰为第一重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文革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从本质上说是具有社会科学性质的经验研究，因此经验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一些西方学者，更多情况是在西方大学以文革为题目做博士论文的研究生，往往在理论框架方面很强而在经验方面很弱，有的时候他们的论著简直是各种理论的重述和罗列，经验事实只是一点不得不要的点缀。有时他们显得是在不相干地卖弄理论知识，他们的理论框架与经验事实明显是分离的两张皮，彼此没有关联。

经验——特别是亲身经验——相当重要，比如，依靠文革中的出版物进行研究容易落入陷阱，因为那时的出版物，不论是官方的还是群众的，都充满了意识形态狂热、偏见、宣传性谎言，需要高度的技巧才能解读这些材料，而经验，尤其是亲身参加过文革的经验，非常有助于这种解读。

当然，我并不认为亲身经历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是研究文革的必需条件，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我们这些亲自参与过文革的人之后文革研究就不可能进行了，这显然与历史研究的事实不相符合。事实上，我发现中国大陆的文革经历者和积极分子对于文革的理解非常成问题，常常还不如外部的研究者，这也许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或者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即使是具有一定经验，不论是亲自参加得到的经验还是从大量的访谈中取得、积累的经验，也不能过分地相信，不能以偏概全，从有限的经验事实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这是一个不容易避免的毛病，因为我们的观察和调查总是有局限的，而我们一定会受到抽取出一一般结论的诱惑。当我们辛辛苦苦地、深入细致地从事调查之后，我们容易相信我们掌握了带规律性的东西。而文革的特征在于它在地区、人群等等方面的差异性，某些西方的研究者不自觉地在这方面落入了陷阱。

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是非常扎实、非常优秀的，但对于这些外部研究者极其冒险的一件事，

是他们不得不从有限的采访和研究中概括出全国的情况。事实证明，几乎所有的西方研究者运气都很不好，他们透彻研究中国一个省的情况，推导出一般的结论，但不幸的是，他们挑选的省份情况都具有特殊性，和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情况不一样。

陈佩华、安德佳、骆思典的研究完全基于广东省的情况，这是自然的，因为文革期间，中国完全向世界封闭，香港是唯一可以观察中国的视窗，从广东逃到香港的前红卫兵成了唯一的，也是丰富的资讯来源。但广东情况特殊，因为林彪的亲信黄永胜尽管镇压造反派，但没有像其他地方的官员那样被撤换，因此广东的情况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保守派始终没有垮台，造反派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的斗争没有明显表现出来，没有发展成为运动中后期的主要矛盾。他们对于群众组织派别对立的观察、分析局限于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这就没有反映全国的情况，也漏掉了大量极其宝贵的资讯。

另一位研究者福斯特（Keith Forster）看到了上面的问题，他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一省的造反和派性：浙江，1966—1976》（*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中宣称，广东接近香港，远离北京，那里的情况代表了例外而非规律，他认为区分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是对干部的评价，这个标准在全国也适用。（38）但他不知道自己遇到的也是特殊情况：浙江的造反组织听从周恩来的劝告支援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被中央文革小组打成保守派而一直受到压制，浙江的“老造反”“红暴会”长期受压，而原因在于中央首长表态出尔反尔，这在全国是十分特殊的。

中国人虽然对于与研究文革相关的当代社会科学理论较为隔膜和陌生，但反而爱表现出一种理论癖好，觉得不把问题上升到形而上学的层面就没有达到某种高度或深度。我经常听到有人对我的研究高度评价和赞誉，但在过奖之词以后则鼓励或要求我一定要在“理论层次”上下工夫，把分析和结论上升到哲学、形而上学的高度。我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文革研究的问题用不着升华得那么高，高入云端未见得是深刻，很可能是空洞、大而无当。我认为在研究的初期，局限于经验事实的收集、积累、辨析和梳理也是不错的，当我感到可以作一定的理论概括的时候，我追求一种我所谓的“中等程度”的理论化，即高于经验事实但不过分抽象而远离事实。

与此相关的是，有些研究者在解释文革中的一些重要现象时，爱一下子就追溯到文化传统或人性的源头。我不相信，两千多年前的孔孟要为文革中发生的事情负责。还有人用宗教的眼光看问题，在历史责任问题上力求深刻，认为罪过的根源不是具体事件的当事人，不是文革的发动者，“我们有原罪，罪恶深藏于每一个人心中”。我认为宗教伦理学原则在这里不适用，这种“深刻”与其说是在深入认识罪恶的根源，不如说是把罪恶分摊到每个人头上而模糊、淡化甚至解脱了文革发动者直接的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

#### 注释

1, Lowell Dittmer, “Book Review: Politics of Chaos/Agrarian Radicalism in China, 1968-1981”,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4, No.3, 1990, pp. 1094-1051.

2, Victor C. Funnell, “Social Stratificat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II, Iss. 2, pp. 14-20.

3, Simon Leys, *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Limited, 1981, p. 13

4, Harry Gelman, “Mao and the Permanent Purge”,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 November-December 1966, pp. 2-12.



- 5, Gargi Dutt and Vidya Prakash Dutt,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70, p.2.
- 6,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1-5.
- 7,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Jonathan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83, September 1980, pp.397-446.
- 8, Parris H.Chang, "Mao's Great Purge: A Political Balance Sheet",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XVIII, No.2, March-April 1969, pp.1-10.
- 9, Frederic C.Teiwes, *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 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New York, M.E.Sharpe, 1984, Ch.1.
- 10,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Ch.20.
- 11, Martin Singer, *Educated Youth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1, p.83.
- 12, Lucia W.Pye, "Reasses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Iss.108, 1986, p.610.
- 13, 许冠三: "有关中共 '文化大革命' 的几点解释", 《明报月刊》1967年, 一月号, 第2-7页; "夺权斗争的布局", 《明报月刊》, 1967年, 二月号, 第84-90页; "'无限风光在险峰'?", 《明报月刊》, 1967年, 三月号, 第34-37页。
- 14, Liu, Guokai,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 & Tran. Anita Chan. Armonk: M. E. Shape, 1987.
- 15, 王希哲,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七十年代月刊》, 1981年二月号。
- 16, 刘青峰编, 《文化大革命: 史实与研究》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年。
- 17, 杨建利主编, 《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 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 1996年。
- 18, Song Yongyi & Sun Daj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 19, Zhou Yuan ed. *The New Collection of the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 Newspapers*, 20 vols. 1999; Song Yongyi ed. *The New Collection of the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 A Compila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in Beijing Area*, 40 vols.; Song Yongyi ed. *The New Collection of the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I, A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Tabloids in the Provinces*, 52 vols. 2007. Oakton, Md.: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 20, Guo Jian, Song Yongyi & Zhou Yua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anham: Scarecrow Press, 2006.
- 21, 宋永毅、孙大进,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香港: 田园书屋, 1997年; 宋永毅主编, 《文革大屠杀》, 香港: 开放杂志, 2002年。
- 22, 王友琴, 《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香港: 开放杂志, 2004年。
- 23, 周孜仁, 《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 美国溪流出版社, 2006年。
- 24, 唯色, 《杀劫》、《西藏记忆: 二十三位耆老口述西藏文革》, 台北: 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
- 25, 周伦佐, 《文革造反派真相》, 香港: 田园书屋, 2006年。
- 26, 刘国凯的 "人民文革丛书" 4卷分别为: 《人民文革论》、《文化革命简析》、《基层文革泥泞路》、和《广州红旗派的兴亡》, 美国博大出版社, 2006年。
- 27, 王希哲,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七十年代月刊》, 1981年二月号, 第49页。

- 28, 杨曦光:“评《中国‘文革’十年史》”,《争鸣》月刊,1990年8月号,第69页。
- 29, 陈佩华:“对文革‘社会冲突论’的意见”,《争鸣》月刊,1990年10月号,第61页。
- 30, Anita Chen,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 No.1, 1992, p.69.
- 31, 杨小凯:“六四省悟:反文革造反派翻案”,《中国之春》月刊,1990年8月号,第42、43页。
- 32, 王绍光:“群众与文化大革命”,载于李少民编:《大陆知识份子论政治、社会、经济》,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90,93—94页。
- 33, Hong Yung Lee,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64, 1975, p.646.
- 34, 杨曦光:“评《中国‘文革’十年史》”,《争鸣》月刊,1990年8月号,第70页。
- 35, 郑义:“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载于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1997年,第400页。
- 36,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4、176页。
- 37, 何蜀论文见本书。
- 38, Forster Keith,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t in a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M.E.Shape, 1990.

□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

## 【不堪回首】

### 砸大昭寺——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革命行动”

• 唯 色 •

那是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但确切的时间对于很多当事者已不记得。或许那只是细枝末节,不必铭记。或许那些日子,每一天都与往日不同,具有破旧立新的意义,纷繁的事件穿插、重叠,使某一个日子在记忆中模糊不清。

然而那天发生的事件,不论当时还是今天都令人震撼,如同西藏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地震。当年拉萨中学的学生久松(化名)回忆说,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是去大昭寺破“四旧”。她的母亲肯定地补充道,那是一个星期三。那个星期三对于这位虔信佛教的藏族老人应该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就在那天,神圣的宗教殿堂被公开践踏,庄严的宗教圣物被任意破坏,显然是老人一生中从未遭遇的劫难,所以在她的记忆里留驻。

如果是8月下旬的星期三,那就应该是24日。

事隔20年,被列为“西藏党校增刊”的一本出版有限、内部发行的《西藏大事辑录(1949—1985)》,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8月24日拉萨一些学校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大破‘四旧’”。作为当时西藏自治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西藏日报》,对此只在1966年8月26日(星期五)第一版,以《造反有理革命万岁 拉萨“红卫兵”举起铁扫帚横扫旧世界》为题,用典型的文革语言将拉萨红卫兵在8月24日的那次“革命行动”抽象化、抒情化,至于事实上是如何“横扫”那个“旧世界”却语焉不详,而对“革命行动”的目标——大昭寺,这座被14世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寺庙”如何被砸更是只字不提。

那天，走上拉萨街头大破“四旧”的是西藏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3月的西藏师范学校（前身为创办于1951年的藏文干部培训班，1985年升格为西藏大学），大多数学生来自西藏各地的农村和牧区，文化水平很低，处于扫盲阶段；也有一些因为形势突变而离开寺院的还俗僧人在此学习。

拉萨中学创办于1956年，一度由14世达赖喇嘛担任名誉校长、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担任校长，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所中学，从当时拉萨仅有的三所小学吸收生源，由初中逐级升到高中，其师资力量很强，除了教授藏文的老师是藏人（基本上是在“旧西藏”接受过寺院或私塾教育的上层人士），其余主要科目的老师都是毕业于内地高等学府的汉人，有的还是内地大学的教师，或因出身不好或有政治问题而被“发配”进藏，但许多人是在共产党的宣传下，怀着理想主义的热情从中国各地奔向西藏的。像陶长松就是其中之一。

陶长松是西藏文化大革命的风云人物。在文革伊始登高一呼，从此一跃登上那变幻莫测的政治舞台达数年之久。他是率领学生们破“四旧”的带队老师，不久当上拉萨两大造反派组织之一“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其对立面是简称“大联指”的“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的总司令，以至许多在西藏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不论藏人还是汉人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陶司令”，后来还曾坐上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副主席）的官位却又随着文革结束沦为阶下囚。1980年代中期以后，以学者身份退居书斋。

他是江苏扬州人，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同年自愿申请进藏，被分在拉萨中学教授汉语文，在学生中颇有威望，这也正是他组建拉萨红卫兵和“造总”的资本。2001年，我两度访问他时，仍在拉萨居住的他年过六旬，虽已退休仍被西藏社科院聘请，主持政府的一些项目课题研究。三十多年过去，清癯依然的他依然是当年的那副装束：鸭舌帽、眼镜和中山服。从他文质彬彬的举止上，实在无从想象在很多人那里听说的他当年是如何地威风凛凛。在我们刚开始交谈时，他是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种汉人知识分子：内敛，沉静，儒雅；但慢慢地就有了些许变化，曾经贯穿他青年和中年时代的某种气质开始流露出来，充溢在他越来越激越的语调和越来越狂热的眼神里。这显然因为我们的话题是西藏文革的缘故。尽管他有时会突然醒觉似的停住滔滔不绝的讲述，歉意地笑笑，但很快又会回到他曾经叱咤一时、辉煌一时且充满变故的从前。

关于拉萨红卫兵的出现，他直率地说：“西藏地区要成立红卫兵，这是新生事物，当时这些学生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搞，我当时在拉中（拉萨中学的简称）是个年轻教师，也有些影响，我实际上也就负责了这个事情。反正很快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但具体日子真的说不清楚。可能是“八·一八”（指的是毛泽东于1966年8月18日，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以后就成立了。

“最早的红卫兵都是学生，因为内地都是中学生嘛。拉中领头的可以说是我，师校（西藏师范学校的简称）领头的是个外名叫“米米”的藏族男教师。不过因为我曾经在师校上过课，彼此都很熟悉，他们也比较听从我。但后来范围就很宽了，因为红卫兵很时髦，所以到处都是红卫兵，居民最多，单位里也很多。这也是因为毛主席一下令，全国都要动起来。”

红卫兵在大昭寺破“四旧”的情况是一个敏感话题，在其他事情上记忆力惊人的陶长松对此却有些泛泛而谈：“我们并不是冲着砸寺院去的，我本人尤其不同意这么干，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文物，需要保护。而寺院被砸，主要还是跟普通群众有关系，他们也混在红卫兵的里面进去了。红卫兵更多是在那些磕长头的人身上贴标语，说他们的行为是封建迷信，很快磕长头

的就见不到了。有时去寺院骚扰一下也是有的，当成“四旧”嘛。但对于红卫兵来说，即使砸寺院也并非乱砸一气，像色拉寺附近的一座小寺院，我们去砸的时候都一一做了登记。

“去大昭寺那次其实在里面的时间并不长，宣传部派人对我们说，总理有指示要保护，我们马上就撤出来了，后来很有可能是居委会的红卫兵又进去过。其实我们去大昭寺就没怎么动，很快我们就出来了，因为周总理有电报。……说句老实话，红卫兵还是很听话的，给大家讲清楚也就没什么了。当时大昭寺是被砸了一点，但没有全部砸得只剩下释迦牟尼一尊像。”

周恩来的这项指示具体不详，从采访中获知是阻止砸大昭寺的指示，但并不包括其他寺院。

前文提到的那位当年拉萨中学的学生久松（化名），在照片上惊讶地认出了自己。在这张合影上，她是第一排右边那个瘦瘦高高、裤子上有两个大补丁的女孩子。看上去很秀气，也很腼腆，而且不像其他同学，手臂上没有红卫兵袖章，手里也没有红缨枪，显得孤零零的。久松说，那时候，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当不了红卫兵，也没有拿红缨枪的资格。

何谓红缨枪？这是一种木棍上插着并不怎么锋利的金属矛头，并系着一束红穗子的古代兵器，在今天看似玩具，即使在当年也并不具备多大的杀伤力，应该说它的象征性远远超出它的实用性。早在中共还是散兵游勇聚结于所谓“革命根据地”的中国乡村时，红缨枪已是捍卫新生红色政权的一个装饰性符号，和红领巾、红袖章等以示有别的标志一样，拥有这类标志也就拥有了成为红色接班人的资格。所以，在特别强调一个人的“阶级成份”的文革时代，对于成长长期的青少年来说，能不能获得一杆红缨枪，乃是能不能划归到革命阵营里的一个大问题。

说起不被允许加入红卫兵的往事，当时壅塞心中的难堪和自卑仍令久松难以释怀。那时候她是拉萨中学初66级（1966年初中毕业）的学生，年仅17岁。眼看身边许多同学都当上了红卫兵，她却只能背负着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包袱无法推卸，实在抬不起头。她记得在砸大昭寺的前一天学校召开动员大会，语文老师陶长松语重心长地开导大家：虽然我们的红卫兵小将都是“翻身农奴”的子弟，但我们并不是歧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关键在于他（她）的立场和表现，这是可以选择的。明天的行动就是检验每个同学的机会，你是站在革命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一边，就看明天的行动。

当时的拉萨中学，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为数不少。这是因为贵族、庄园主和商人之家历来有送儿女上学的传统，但底层百姓苦于贫穷，哪里有能力让子女求学？为了吸引藏人不再沿袭把孩子送到寺院或私塾接受教育的习俗，更出于从中培养所谓“民族干部”的目的，在文革之前，但凡就读于拉萨中学的学生，无论哪种家庭出身，统统每月都可领到政府发的30块大洋（银元）。与中国内地当时的情形相似，一个人如果家庭出身不好，肯定会被打入另册，也因此他们的学生时代十分黯淡。比如同样出身商人家庭、又因祖母“参叛”（“参加叛乱”的简称，指参加1959年3月在拉萨发生的藏人反抗中共的事件。中共予以军事镇压，称其为“平息反革命叛乱”，简称“平叛”）而遭另眼相看的初中生次多至今难忘，由于他给课本上的岳飞像画了一顶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的帽子，被同学向班主任打了小报告，班主任虽是一个成分也不好的藏族老师，却很“革命”，就此事上纲上线，认为次多对民族英雄岳飞怀有“阶级仇恨”，又是开批判会又是让他写检查，使得还是13岁的次多痛苦难忍，甚至有了寻死的念头。那是1964年，“唯成分论”的阴影已经笼罩在许多年幼的中学生身上。

截至1966年8月，实行寄宿制的拉萨中学总共12个班（高中4个班，初中8个班），共计360多名学生，外加从其他县招收的两百多名出身贫苦的新生，一概住校。其中汉族学生近百人，可以享受与55名教职员工共用一个食堂的待遇，较藏族学生特殊化。

8月24日，天高云淡，阳光灿烂。一大早，新华社驻西藏分社的记者们敲锣打鼓地到拉萨中学送大字报，这在当时是最时尚的“革命行动”之一。以居委会为主的拉萨各单位的积极分子约上百人也赶来了。学校的高音喇叭里传来数学老师谢方艺的声音，他要求全体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到操场集合。在发誓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遍西藏各个角落的口号声响过之后，全校师生与各单位的积极分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革命歌曲，向拉萨城东进发。都说那时候从拉萨中学到大昭寺的距离似乎比今天远多了，可能是这之间并没有如今那么多商号、闹市的缘故，一路皆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流沙河从色拉寺背后的高山上奔流下来，使得城北一大片尽是今已不复存在的湿地和阡陌。走在前面的都是当上了红卫兵的“小将”，戴着红袖章，扛着红缨枪，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走在后面的就不同了，有的肩上扛着学校发的棍子，有的什么也没有，两手空空，这都是出身不怎么样的学生，属于“革命师生”。

可是，为何也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能够加入红卫兵呢？比如这张合影上站在第一排中间穿浅色上衣的那个女孩是高66级（1966年高中毕业）学生，出身于贵族世家，按理说是不可能戴红卫兵袖章的，也不可能拿红缨枪的。第一排左数第三个女孩是她的妹妹，也是一位红卫兵。又比如另一张照片上的两个女红卫兵出身于商人之家，本也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的。像她们这种人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阿达”的孩子。“阿达”是“三大领主”的意思，属于被视为专政对象的“黑五类”（即当时中国内地所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据说在破“四旧”时，冲在前面的有不少“阿达”的孩子，其理由是为了改造思想，“三大领主”的后代被认为最应该将功赎罪。

在这张合影上，第一排左一那个只有大半边身影的人正是数学老师谢方艺，他是学校团总支书记，也是拉萨中学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后来是“造总”的头头之一，1980年代末调回老家福建，现已去世。据说正是这位谢老师在这次去大昭寺之前，专门挑选了一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于是，本来不可能戴红袖章、拿红缨枪的“阿达”的孩子们，也有人因表现积极而当上了红卫兵。事实果真如此吗？时光流逝不过40年，却已有如许多的疑窦丛生，对于当时为何不是红卫兵或者为何不努力成为红卫兵，恐怕久松自己也很难说得清楚了。

被辨认出的还有第一排左五、左六、左八三个女孩，都是汉人，是初六六级汉族班的学生。

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当天部分师生的合影。那么其他人为何没有参加合影呢？还有，这是在砸大昭寺之前拍摄的，还是在砸大昭寺之后拍摄的？如今说法不一。不过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这幅照片给很多当年的参与者带来莫大冲击，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或者自己熟悉的人就在这合影当中，霎那的愣怔之间往事纷纭，已掠过眼前，——那是他们并不愿意回首的青春往事。有人神情复杂，良久才说：“我们也是历史的罪人啊。”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